

评郑观应的实业救国思想

苗宏慧 么巧亭

中图分类号: K25 文献标识码: A 文章编号: 0257-0246 (2013) 07-0275-02

近代首先提出并系统论述实业救国思想的,应首推郑观应。郑观应所著《盛世危言》,在早期改良派“商为国本”的基础上,提出并论述了“商战固本”的“商战”理论,把“商为国本”思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。1893年,郑观应又在“振兴商务”的基础上,进一步提出“振兴实业”的主张,并在《盛世危言后编》中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论述,从而形成了实业救国思想的理论体系。对郑观应实业救国思想的深入研究和重新评价,有助于加深对近代实业救国思想的认识。

一、郑观应的企业家业绩和所处时代背景

在中国近代史上,郑观应的名字是同《盛世危言》联系在一起的,以往学术界大多从思想家的角度对他进行评介。实际上,郑观应不仅是著名的思想家,也是杰出的企业家。郑观应的企业家业绩和所处时代,与他实业救国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关系。

自洋务运动兴起后,由盛宣怀等人先后创办并经营管理的轮船招商局、电报总局、华盛纺织厂、汉冶萍铁厂煤矿有限公司、铁路总公司、中国通商银行等大型企业的,囊括了中国近代的航运、电讯、纺织、矿业与金属冶炼、铁路修筑和银行等诸多重要部门,构成了中国早期近代企业的主体部分。值得一提的是,郑观应参与了上述六大企业和企业集团的经营管理活动,并担任重要领导职务,是盛宣怀最为得力的助手。盛宣怀创办、经营管理近代企业所取得的成就,同郑观应的努力和贡献密不可分。

据《郑观应年谱简编》记载,郑观应在1878年11月至1921年5月间,曾在上述六大企业和企业集团担任织布局会办、上海电报局总办、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、轮船招商局会办及总办、开平煤矿局粤局总办、汉阳铁厂总办、粤汉铁路总董、铁路公司总董、电报局总董、江西萍乡及安徽宣城煤矿总董、广州商务总会协理等职。

郑观应具有杰出的企业家才能,在上述企业任职期

间成就非凡。其中,在轮船招商局处境艰难的时刻,曾三次“入局”,并奇迹般地迅速扭转局面,使公司股价飙升。郑观应经营管理近代企业的业绩与贡献,为他的实业救国理论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。

为深入认识郑观应的实业救国思想,本着“知人论世”的原则,有必要回到他所处的时代。郑观应出生于中英签订南京条约的1842年。1860年,英法联军攻陷北京,逼迫清政府签订《中英北京条约》、《中法北京条约》,沙俄趁机要挟清政府订立《中俄北京条约》,强行割占乌苏里江以东的40万平方公里领土。郑观应对此十分气愤,他说“庚申之变,目击时艰,凡属臣民,无不眦裂。”^①《马关条约》、《辛丑条约》的签订,使中华民族的灾难更加深重,中国的半殖民地程度进一步加深了。

郑观应目睹国家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,促使他把心血倾注在著书立说上,以“危言”来唤醒苦难的人们。《救时揭要》、《易言》、《盛世危言》、《盛世危言后编》的撰写和相继多次出版、修改、再版,展现了他一生著书立说的历程和良苦用心。郑观应实业救国思想的形成,是同他的企业家实践和所处时代联系在一起的。

二、从“商为国本”到“商战固本”的飞跃

郑观应的实业救国思想,不仅同他的企业家实践和所处的时代密切相连,而且有其思想上的渊源。他吸取了早期改良派思想家的积极成果,又把时人的有关思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。

在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的驱动下,随着企业家阅历和经验的逐渐积累、国家危机的日益加深,他的抵御外侮、富强国家的思想也随之不断地丰富发展起来。郑观应在“商为国本”思想基础上所提出的“商战固本”的“商战”理论,是他实业救国思想的第一次飞跃,亦是近代中国实业救国思想的初始阶段。^②

郑观应“商战固本”的“商战”理论,其基本内容

① 夏东元《郑观应年谱简编》,载《郑观应集》下,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8年,第1531页。

② 邵德门《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》,北京:法律出版社,1983年,第123-124页。

见于五卷本《盛世危言》的《商战》和《商务》，有如下五个要点：一曰“习兵战不如习商战”；二曰“以商富国，以兵卫商”；三曰兵战与商战二者缺一不可，但应当以商战为主；四曰以兵战治标，以商战固本；五曰“欲制西人以自强，莫如振兴商务”。这第五点，是郑观应“商战”理论的核心内容。郑观应在论述“兵战”与“商战”二者的关系时，明确指出西方列强的历史经验是“泰西各国商务日振，国势日强，民生日富。”事实上，郑观应的商战固本是把国家的综合实力作为“制西人以自强”的资本，认为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二者虽然缺一不可，但经济实力更为重要。

上述五点表明，郑观应的商战固本理论自成体系，把王韬的“商为国本”思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；而“振兴商务”理论又赋予“商战固本”理论以实践上的意义。从“商为国本”到“商战固本”的飞跃，是郑观应实业救国思想的初始阶段。

三、从“振兴商务”到“振兴实业”的飞跃

在郑观应的商战固本理论中，“商战固本”与“振兴商务”有着大致相同的内涵。关于振兴商务的含义，郑观应说“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，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，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。是以商贾具生财之大道，而握四民之纲领也。商之义大矣哉！”^①

郑观应的商为“四业”之首的认识，在1893年前后开始发生了根本的转变。这一根本转变的主要标志是“振兴实业”理论的提出。从“振兴商务”到“振兴实业”，是郑观应实业救国思想的又一重大飞跃，亦是近代中国实业救国思想的初步形成的标志。

近代中国“振兴实业”命题的提出，最早见于郑观应1893年写给金荃仁的上书。他说“查工艺一道，向为士大夫鄙为末技，谓与国家无足轻重。不知富强之国，首在振兴实业、改良制造，多设工艺厂。”从1893年到1922年郑观应逝世的30年间，他的“振兴实业”思想有一个不断发展、丰富的过程。概括地说，郑观应的实业救国思想有以下五个要点：

其一，从极力鼓吹“商战”、“振兴商务”到大力宣传和推动“振兴实业”，在认识上完成了由“振兴商务”

向“振兴实业”的飞跃。1893年以前，郑观应大谈特谈的是“商战”与“振兴商务”；1893年以后，他所大声疾呼的则是“振兴实业”，很少再谈及“商战”与“振兴商务”。

其二，1893年后的一段时间里，郑观应对“振兴实业”的最初表述为“振工商”、“振兴工商”、“振兴农工商”，并且对“实业”概念的涵义（即含农、工、商诸业）作出了说明，论述了振兴实业与农工商的关系。他在给孙燮臣的上书中提出“振兴农工”，主张“各省宜研究实业，奖励工商”。

其三，在向政府官员和著名企业家建言献策时，论述了“振兴实业”与富强国家的关系，阐述了“自强致富”以抵御外侮的最新主张。在给金荃仁的上书中，郑观应指出“富强之国，首在振兴实业”。在给梁纶卿的书信中，郑观应说“欲强国，先富国；欲富国，先富民。而富民之道，则不外以实业为总枢，欧美各国历史昭昭可考。”^②

其四，在向政府官员和著名企业家献策时，又论述了“振兴实业”与发展教育的关系，对“实业救国”与“教育救国”思想洪流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郑观应在给潘兰史征君的信中说“自民国以来……其余如振兴实业，发展教育，开辟荒地次第施行，未有不可之理。”

其五，把倡导、实践“振兴实业”，看成是自己一生的重要使命。他在给何闾樵茂才的信中说“观应置身商界数十年……然无日不以提创实业为事……”^③事实表明，郑观应不仅是提出实业救国理论的思想家，也是鼓吹实业救国的社会活动家，还是实践实业救国的企业家。

郑观应的思想家、社会活动家和企业家的特殊社会身份，特别是他实业救国思想的系统性、丰富性与科学性，使得他的《盛世危言》、《盛世危言后编》出版后，立即在社会舆论界、工商界产生了极具震撼力的影响，实业救国思想迅速成为当时各党派及各界进步人士的共识。从康有为到孙中山、毛泽东，无不对郑观应的《盛世危言》珍爱有加。直到今天，郑观应的实业救国思想，仍然是中华儿女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。

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商学院

① 郑观应《商务二》，载《郑观应集》上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607页。

② 夏东元《郑观应年谱简编》，载《郑观应集》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314页。

③ 夏东元《郑观应年谱简编》，载《郑观应集》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410页。